

文物保护碑也成文物

故事了解完还有故事

我用四年时间搞清了城子崖遗址文保碑的书丹人

□刘文涛

——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我国文物行政部门对不可移动文物所核定的最高保护级别。1961年3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特别重要的不可以动文物180处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山东省有8处在列，其中就有城子崖遗址。这是山东最早发掘的史前遗址，1928年由吴金鼎先生发现，经20世纪30年代和90年代，2010年代至今，持续的考古发掘工作，创造了中国考古学史上多项第一，被誉为中国的“考古圣地”。

2018年3—8月，我有幸在城子崖遗址西侧的宋金冶铸遗址发掘5个月。虽然发掘的文化堆积不是新石器时期，但发掘点距遗址西城墙不足百米，也算是得沐圣地之光。城子崖遗址的文保碑就在遗址西城墙的高台上，台下是老济青公路。在我看来这块文保碑是城子崖遗址最有代表的一处景致，慕名而来的外地人多在此拍照留念，周边村庄的小孩儿们也在这里当成了天然游乐场。我天天上下工路过这里，天天瞅上几眼，“日久生情”，我禁不住琢磨起这块保护碑来。

2018年4月的一天，我画完探方内的灰坑图，坐在隔梁上和隔壁探方的张宗国兄闲聊天，抬头看见旁边高台上的文保碑。我随口问这碑是啥时候立的？宗国兄想了想说“碑上写着一九六一年三月四日公布，山东省人民委员会立，是不是1961年立的？”我随口“哦哦”答应着。这时探方里的李承祥大爷插话，“不是1961年，是1964年。”

这个李大爷可不简单，喜读书，爱思考，见过世面，为人低调。从1990年就参与城子崖遗址发掘，对考古这一套流程他极为熟悉，虽是民工，但深得各个时期考古队队长的信任与倚重。我来了兴趣，就听李大爷讲起了这件事的始末：“1964年9月，这个保护碑是在青岛雕刻的，用的是崂山花岗岩。刻好后用汽车拉到我们龙山村当时有个大车店的路边，就是现在信用社的位置。拉来后，公社请胶济铁路平陵城站的装卸队，带着倒链等工具来安装的保护碑，当时有三个人，一个木工，一个瓦工，还有一个就是我。我干的是壮工，就是给他们帮忙搬抬打下手。因为这是我下学后干的第一份工作，所以我记得很清楚。”

这就跟考古发掘一样，下一铲子永远不知会出现什么奇迹，无意的询问，竟碰上了亲历者。我又问碑上的隶书“城子崖遗址”几个字是谁写的，李大爷说听说是一位副省长写的，具体是谁，他也不知道。这个事儿到此结束，我知道了保护碑的安装时间，安装经过，关于书丹人，线索仅仅是位副省长，具体是谁，暂无线索，听完也就放下了，这一放就是四年。

二
2022年春节期间，我在朋友圈看中央美院耿朔兄的访谈报道。耿兄在我同道、同龄人中极具个性，他从不只闷在书斋中做学问，爱到处跑着访古寻幽，4000多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迄今他已到访过900多处。我没有耿兄的魄力与毅力，但山东省内的我



城子崖遗址文物保护碑。

还是去过一些。在梳理中我发现山东第一批全国文保单位中就是离得最近的四门塔没去过。后又在检索四门塔简介中，发现有文章记载四门塔文保碑是时任山东省副省长李予昂先生所题。“副省长”！四年前李大爷所说城子崖文保碑的书丹人也是副省长，是不是李予昂先生？有了这个线索，我就有的放矢了。

我先对比四门塔文保碑上“门”字首笔竖画与城子崖文保碑上“崖”字撇画，都是竖势到底重顿再向上外翻挑出，极尽灵动之感，而“塔”字捺画与“城”字竖弯钩都没有按一般隶书写法末端处理成右出波磔，而是上重下轻，渐行渐收，这是李先生隶书个人面貌，我又查看李先生的传世书法作品，捺画、竖弯钩基本都是如此写法。“城、子、址”李先生都有其墨迹本传世，其结构、书风与上述一般无二。这是他的书写习惯与特点，就类似考古里面的器物类型学对比，是内涵，不是说就变的。这样也就确定城子崖遗址文保碑是李先生书丹无疑。再看省内其他第一批文保单位文保碑，“临淄齐故城遗址”的“城”字，“武氏墓群石刻”的“武、氏”字的竖弯钩都与上述一致。还有一个小证据，临淄东周墓殉马坑匾额是李先生1983年书写，上面“临淄”两个字与“临淄齐故城遗址”中的“临淄”二字也一致。这样基本能确定上述四块文保碑为李先生题写名称。再看这几块文保碑的形制都是上为横长方形，下承须弥座，材质都是鼎鼎有名的青岛红花岗岩，就是北京人民英雄纪念碑碑心使用的材料。上乘的材质，精彩的题名，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山东省对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视程度。

至此，城子崖遗址文保碑的来龙去脉基本搞清，我还有点放不下，就是对这位李予昂先生不太了解。如同勘探一处古代遗址，地层中的文化堆积基本了解了，下一步肯定是对遗址分布范围了解清楚。

三
我先从网上搜索文献，了解到李予昂先生是山西平遥人，是著名的经济学家、书法家，早年就读于国立北平美术学校，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新中国第一任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局长。1958年调任山东，历任山东省委财贸部部长、省委常委、副省长，

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兼任山东财办主任、山东财经学院院长等职。想到李先生是山西平遥人，能从山西找到先生的其他信息吗？我首先想到了山西书院院张剑锋兄，老兄驰骋三晋，交游甚广，我给他打电话，托请他帮忙打听联系。不到二十分钟，剑锋兄发来微信，说给问到了，原平遥古城书画院院长郭保旺先生是李予昂先生的学生，“郭先生新出《李予昂遗翰》，要送你一本，可详细了解”。未了，剑锋兄附说了一句“李先生是日升昌票号东家李大全家的后代”。

感谢郭先生是自然，但知道李先生的身世我还是有点吃惊，日升昌票号，那时中国民族银行业的“乡下祖宗”，是中国金融史上一个里程碑所在。从清代道光年始，至民国初年衰，历经百年，分号遍及全国，业务远及欧美、东南亚，以“汇通天下”之势，执中国金融界之牛耳。李先生出身晋商名门，虽到李先生出生时家业已衰败，但他对新中国的经济财务、税收制度所做的巨大贡献不可否认有天赋的遗传和环境的熏陶。

再读郭先生赐赠大著，我了解到李先生在山东所留墨宝颇多，崂山狮峰、珍珠泉浮玕亭，尼山夫子洞，趵突泉群马跑泉、柳絮泉等皆为先生所题。书中还载李先生的故居在南新街51号，现在是省级文保单位，利用一个午后我骑电动车寻访到先生故居，二层的小洋楼，藤萝爬满山墙，现在是一家单位用房。李先生很多书法作品落款中有“书于趵突泉南之寄舍”，这里就是先生作品中的寄舍了。

城子崖遗址已历几千年风雨，史上的第一块文保碑也屹立于高台上近一个甲子。见证了太多的风云变幻，人事代谢，曾经为保护文物所立的保护碑如今也成了文物。一方冷冰冰的石碑，历经时光的积淀，岁月的磨砺，也变得有了温度，蕴含了故事。我是幸运的，因为我感知到了他的温度，听到了他的故事，也了解了一段历史。（作者供职于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编辑：马纯潇

扫码下载齐鲁壹点
找记者 上壹点

组版：刘燕

1993年，袁和平执导电影《太极张三丰》。彼时红透全国、正值当打之年的李连杰，成为这部电影当仁不让的男主角人选。在片中他饰演的张君宝被董天宝背叛后精神失常，每天疯疯癫癫，被道长戏称为“三疯”，因此又名“张三疯”。

年幼时以为张真人的“三疯”诨号是杜撰出来的，不料日后翻过文献，才发现虽然片中不少情节都属虚构，但这“三疯”之名倒确有其事。

刘志斌

三疯？三封？还是三峰？

按明史所载，张三丰“龟形鹤背，大耳圆目，须髯如戟”，形象上十分有特色，还说他是“寒暑惟一衲一裘”“或数日一食，或数月不食”，说明他不怕冷不怕热，吃一顿可以扛几天甚至更久，足见天赋异禀。不仅如此，还能“书经目不忘，游止无恒，或云能一日千里”。这脑力和体力更是超强，性格上则是“善嬉，旁若无人”，还说他“外表邈邈”，可谓又穷又脏，兼之行事放肆，因此民间称之为“邈邈张”，又称“张三疯”。

当然，在“张三丰”三个字里，除了“张三”大家没有异议之外，最后这个字的争议其实很多，而且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比如，《张三丰本传》中称张三丰云游天下时在宝鸡偶遇三尖山，“三峰挺秀，苍润可喜，乃居其间，自号三丰居士”，因此张三丰又有“张三峰”的名号；武当山则声称张三丰早年在朝中为官，受过三次皇封，因此取名“张三封”以示深受皇恩；不过后来时光荏苒，老张终于明白这伴君如伴虎的道理，索性弃官修道，改“三封”为“三丰”——三丰者，乃八卦图中乾三连、坤六断的符号，因此张三丰试图以此表明自己崇道的决心。

被朱棣决定的名字

这话说起来，跟明成祖朱棣脱不开干系。当年朱棣靖难成功后为了平息“杀侄篡位”的流言，一心想要利用宗教因素平息舆论，宣扬自家威名。朱棣前思后想，最终决定从武当山下手，为自己营造赫赫威名：传说武当山是真武大帝的道场，而真武乃北方之神，北方之神南下在湖北武当山建立道场，坐镇天下，岂不正与朱棣“南下坐天下”的行为相吻合吗？

朱棣一声令下，军民三十万前往武当山，集天下之力修成七宫九观三十六庵堂七十二岩庙，所耗费人力、物力之大难以想象，是与故官并驾齐驱的明朝两大皇家建筑工程之一。其中大殿中的真武像据说就是效仿朱棣面容。

不过尴尬的地方在于，朱棣想要大修武当山，总得找个明面上的理由。而元末以来，天下流传的奇人异士中最为著名的就数“张三丰”。因此，在朱棣的推波助澜下，“张三丰与武当山”之间的关系开始迅速升温。

如果我们按照时间顺序来考察历史文献，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景象：在明初以前，张三丰的行踪可谓飘忽不定，遍迹天下，陕、川、鄂、滇、黔各省都有所谓的“张三丰云游踪迹”，而又有文献指出他生于东北：“张师名玄玄，辽阳人，自号三丰遁叟。世人因其号，第称之曰三丰。”如此说来，张三丰的行动轨迹竟然横跨了整个中国版图。

明朝永乐年间后，张三丰飘忽不定的行踪却忽然有了——武当山。按《太岳太和山志》所载：明太祖洪武初，张三丰至武当山，于武当展旗峰北结庐而居。妙的是他一到武当山，就表示“吾山异日与今日，大有不同矣”，此后他在武当山经营

数年，在“洪武二十三年，拂袖长往，不知所止”。

撰写《太岳太和山志》的这个人名叫任自垣，乃明代道士，明成祖永乐九年授道录司右正义，与明代皇家关系颇深。因此这《太岳太和山志》写成之后很快就成了明代对张三丰身份的“正论”，甚至被后来的《明史》所采信。而明成祖朱棣得知武当山上有活神仙张三丰之后多次寻访高人，遍访无果之下命人大修武当山，甚至专门为张三丰修建了一处殿宇，此后屡屡对其加封，无形中又提高了这位道教“活神仙”的地位。

所以说，张三丰到底底是叫“三峰”“三封”还是“三疯”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张三丰作为活神仙，必须要跟道教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必须得是“龟形鹤背”的奇葩形体，也一定得叫“三丰”才成。

他被推上神坛

新中国成立后，有学者曾搜集了各地散佚的“张三丰传说”，出乎意料的是，这些传说中的张三丰不像是一位神仙，倒更像是一位“侠盗”，他在各地行侠仗义、劫富济贫，时而从皇帝的库房里偷出银子来救济穷人，时而不用品葫芦吸走贪官污吏把他们变成螃蟹，陕、鄂、黔各省的传说中都称他为“邈邈张”，说他行事癫狂，却心地善良。

因此，从这些传说中推断，可能元末明初时确实存在过这样一位云游天下的张道人，他必然身体强壮，拳脚了得——不然就没法在天下大乱时云游四方，借以自保；而他邈邈癫狂的行事风格可能也是真实存在的——因为常年云游行脚，没有固定收入来源，很难让他顾及自己的外形；他必然喜欢多管闲事，曾经仗义出手帮助过穷苦百姓——不然不会有如此之多的传说都与他惩恶扬善有关。所以，这样一位疯疯癫癫的老道士，在大众口中被称为“张三疯”的可能性，反而会更加一点。

不过，对需要他来的人来说，这些都不重要。现存文献中张三丰的各种名、字、号超过20余种，繁芜纷乱，难有定论，自明代《太岳太和山志》修成之后，张三丰逐渐成为大家公认的“唯一正品”。

随着张三丰这位“活神仙”事迹的广泛流传，他的生卒年月也变得奇妙起来，清代不少学者甚至将张三丰的最早活动轨迹推到了北宋时期，黄宗羲曾在《南雷文定·王征南墓志铭》中声称：“三峰为武当丹士，徽宗召之，道梗不得进，夜梦玄帝授之拳法。”要知道，宋徽宗生活的北宋末年大概在1100年前后，而张三丰事迹主要集中在元末明初，也就是1350年前后，如此说来，张三丰至少活了两百多年，已然突破人类极限，显然是活神仙无疑了。

当代学者们对这种奇妙现象进行过讨论，总的来说，大家认为大量出现的历史文献除了让我们可以确认元末明初确实存在一位“张三丰”之外，我们其他能确定的事情相当之少。